

元宵节，荡秋千

· 王国成

清代《盐源竹枝词》云：“高悬彩架接云天，共庆新年胜旧年；姊妹艳装争奇丽，倩郎抛索送秋千。”这首诗形象地描述了清人荡秋千的情形。

《荆楚岁时记》是记录中国古代楚地节日风物故事的笔记体文集，其文十六节云：“以纆作纆绳相胃，绵亘数里，鸣鼓牵之。公输子自游楚，为载舟之戏，退则钩之，进则强之，名曰‘钩强’，遂以钩为戏”。《涅槃经》曰：“斗轮骨轮索，其秋迁之戏乎？”

《汉武帝后庭秋千秋》曾云：“秋千者，千秋也。”汉武祈千秋之寿，故后官多秋千之乐。”

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“水秋千”。南宋吴自牧《梦粱录》记载，北宋汴京的金明池，南宋临安西湖、钱塘江，都举行过这类活动。但凡举行此类表演，它霎时可惊动上至庙堂的皇亲国戚，下至街陌的庶民百姓。据记载：此活动的秋千架固定在两艘船头之上。表演之际，船上鼓声齐鸣，杂耍艺人首先上竿耍玩，之后依次登上秋千，奋力游荡。当荡秋千者游至和秋千横梁几乎相平时，他们突然双手脱绳，凭秋千惯力纵身空中，然后翻个空中斤斗，纵身入水……“水秋千”近似现代的跳水运动，它是宋人在杂技项目上的一个新发展，动作惊险优美而变化无穷。

现在我们常见的秋千都是架在土地上的。我们河南人说话干脆，把秋千的千字一省略，干脆叫它为秋。并把固定秋千架于杆的活儿称作缚秋，把荡秋千游戏称作打秋。

打秋的活动每年元宵节最为广泛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元宵节几乎村村都缚，有的大村甚至缚了好几架。那年月的秋千结构，大约在5米距离的两端各牢固在地上竖起一个由圆木捆绑组成的三角形架子，架高5米或更高一些。三角架上用一根棍作秋梁的圆木连接结实，秋梁上套两个可作半圆运动的木质或铁质圆圈，俗称秋轴（儿化音）的东西。为防止秋轴向秋梁中间滑动，它的两头分别用细绳牵制。秋轴下面由秋绳连接踏板，秋绳有两种材质，一种是棕绳，一种是竹竿，听人说，竹秋比绳秋起得利落起得快。这种秋千是作上下游荡动作的。

另一种作圆转动作的秋千，叫转转秋。五十年前的转转秋底座用的是牛车轴，车轴固定结实后，再绑上秋千架，因

转转秋做的是圆周运动，很多人不适应。它能把人转得头晕眼花，甚至干呕。

再一种叫轱辘秋。轱辘秋更有刺激，它是在直立5-6米的高竿上先固定一个与地面平行的横木，横木一端固定一个打水的轱辘，另一端固定一个起平衡轱辘和人身重量的物体。为了奖励打秋人，还要在轱辘上方高10厘米、50厘米、100厘米的地方挂上不同等级的奖品。譬如盒烟、3盒烟、1条烟。为了人身安全，秋千下地面上还得铺一层厚厚的保护物。秋千上轱辘能随便做圆周运动，轱辘圈上的绳子缠绕两圈后两头拉近地面。蹬秋者将绳子一头固定脚上，另一头双手抓紧向下拽绳子，凭借轱辘转动把自己的身子慢慢带到秋梁上的秋轱辘处。打秋人攀到秋千横梁后，得用一只手将两绳抓在一起，腾出另一只手去摘取奖品。比轱辘高10厘米的奖品易摘，50厘米与100厘米的奖品要想摘掉，必须靠胆子和技巧，游戏人得想法骑在轱辘上面，很多人这时稍有不慎就会从秋千平梁高处平身落地。这种形式的秋千具有一定的危险性。

现在的秋千架子大多由铁竿组成，秋绳也改作铁链。但总感觉它的游荡效果与老式秋千不能同语。

另外，昔日元宵节中，那些争不住秋的小童仔们，便开始回家嚷嚷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了。这时的长辈们为了哄孩子，会随便找根结实的绳子，在门框上、树枝上就那么一绑，儿童们便高兴地坐在秋上摇晃了，摇晃中他（她）会回报给大人们一个节日的笑脸。

元宵节缚秋活动有的村子正月初十就动手了，最迟的村子也得在十三下午缚好。秋缚好后，为了人们的安全，还得给秋架点上一炷香。

晚上是打秋最热闹的时候。那年月，大多数农村还没用上电，收音机少之又少，无电视、更无手机，明晃晃大月亮（只要不下雨雪，阴天亦一样）底下的秋千旁，又说又笑又争又吵，场面热闹非常。有一个人独踮的；有两个人并肩背面对踮的；有带小孩踮的。

“下来，下来，不能要赖皮！”在众人吆喝下，有些赖皮人才会被迫下去。“该轮我了！该轮我了！”这是争秋的声音。“带带我吧，带带我吧！”这是儿童求大人带秋的声音。“这回该带我了，这回该带我了！”这是强势儿童争秋的声音。“娘，娘，我也要



打，我也要打！”这是腼腆小孩乞求大人帮助的声音。“别争，别争，这回咋说也该轮到俺了！”这是奶奶妈妈辈们帮儿孙们争秋的声音……

虽然说元宵节还在数九天气，但秋千似乎是一团火，帮助玩耍人把寒气驱逐得干干净净，使争抢打秋的人们把夜熬得很深很深。

白天，因为看得更清楚，秋起速度的高和低，令看秋者人人争着当裁判。“真造，真造，三下五除二可惹平梁了！”赏秋人这时便会发出不同的评论，像是给游戏人打分。

秋千上升的快慢，与打秋人分绳的力气与技术有关。所谓分绳，即游戏者在蹬秋的同时用双臂将秋绳向两边撑开的技巧。为此，技术娴熟的打秋者，每每上场总会下意识地将来秋绳向左右摆几下。不过要想秋千起高得快，除了用力尽量将秋绳分得远一点外，还得掐好分绳的时间点，这是一个关键。这个时间点应在秋千刚向下回落的时候进行，错前错后都影响着秋千起升的效果。

打秋千除了蹬秋外，还有送秋与悠秋之说。送秋就是一个人坐在秋踏板上，让另一个人站在后面用手向前推着悠荡。悠秋是体弱人的活儿，他们因无力蹬高，会稍蹬一会，便利用惯性悠一会。停会再蹬几下，再悠一会。

壮劳力打秋时，为了压秋踏板，往往会让孩子坐在踏板上。秋千在荡漾的过程中，从高处向下俯冲的那一刹那，坐在踏板上的孩子有一种提心吊胆的害怕感，有的可能被吓得噢噢直哭！这时围观人群中便会不约而同地发出“丢手抱滴脑！丢手抱滴脑！”这一时间中，真正丢手的事情还确实发生过，那一刻是十分惊心动魄，由此还摔伤过一些儿童。有被众人唤作“秋毛”的儿童，死皮赖脸，坐在秋板上就是不下去，这个人带罢他还让那个人再带，他下秋板不是被长辈大声呵斥，便是被比他更强势者死拽下去。

过去听说过一个笑话，韩复榘看到打篮球乱抢的场面时突发奇想，对身边人说，一群人争那一个球，每人给发一个，各打各的，看他们还争不！荡秋千也是越争越吵越热闹，那是一种气氛。笔者曾在没人争抢的情况下，连“秋毛”们荡会儿也没有了兴趣，没人撵自个打着打着便不打了。

元宵节的秋千活动，一般从正月十三开始，到正月十七结束，被人们戏称“闹十七”。秋架子过了十七就要被拆掉，因为元宵已过，春耕大忙即到来，人们该向节日拜拜了。

秋千架子拆后，新一年的劳碌就开始了。

· 连载 ·



(上接第3022期)

吕师傅刚要出门买菜的时候，他哥哥吕正正好来了，跟我们在大厅碰了个面对面。吕正兴在县科委工作，和习总书记认识，听我们说习总书记来调研，食堂也没有饭菜了，他就说：“那就别张罗饭菜了，到我家吃饭吧！”

于是，我去叫上习总书记，我们几个都骑着自行车，到了吕正兴家。我和吕正兴给习总书记简单聊了聊大队的基本情况。当时，我们聊到东兆通有一个玻璃厂，那个厂不算景气，经营得不太好。我主要谈了谈大队现在是怎么办的，怎么解决问题的。习总书记听得很认真。

谈了一会儿，吕师傅炒好了四五道菜，饭也做好了，我们就吃饭。习总书记一边吃一边跟我们聊，问了其他乡镇企业经营的情况。

当时，改革开放刚刚开始，从干部到群众思想都不太统一，“左”的思想还很有市场。这种情况下，乡镇企业的发展受到很大束缚。我们十里堡有个钢厂，主要生产钢窗、建筑、建材，这是一个小厂子，其他上规模的工厂就没有了。习总书记把这些厂子的情况比较详细地问了一下，问到了这些乡镇企业的规模、经营的效益、人员的构成、工人的技术水准等等。我因为来的时间不长，不到一年，所以当时掌握的情况也不是很多，说得也不多，就是把我了解的一些基本情况都跟习总书记讲了。

习总书记就说起集中发展个体经济、乡镇企业的好处，而且提出不但要放心大胆地搞，还要上规模。他还说，咱们应该走出去，多看看沿海、南方是怎么发展起来的。后来，我们又谈到了农业。我们当时的农业生产比较简单，主要就是小麦、玉米，习总书记说：“农业只靠这些也不行，要搞现代农业，要大力发展深加工、养殖、肉蛋奶，供应城市，抓准城市的需求来发展农村经济，这样才能让老百姓的生活好起来。”

我们一边吃着饭，一边听习总书记讲，这个把小时真是充实。他确实讲得好，我们一边听着，心里暗自佩服——别看习总书记这么年轻，真是有思想、有水平。那天晚上，习总书记熬夜把我们公社1979年到1981年这3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年报全都看完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去看他，他把年报还给我，说：“这些年报我都看完了，你收起来吧。”我说：“习总书记，你一晚上看这么多资料，够辛苦的。”

接下来，习总书记跟我告别，骑自行车赶路回县城了。本来周末可以好好休息的，他还冒着小雨骑车到我们这里来搞调研，真是不容易。

采访组：从那次以后，习近平同志再来到西兆通公社，您和他又见过面吗？

李正：又见过一次，是在1983年春夏之交。那次，他也是来我们公社搞调研，但不是我接待的他。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我在公社后面的食堂遇见了他。当时他正在和公社的同志们一起排队打饭。打好了饭，他就坐在食堂外面的水泥凳子上，和大家一起在用水泥废楼板搭的“饭桌”上吃饭。一边吃，一边和我们聊天，很轻松也很愉快。

习总书记的人才战略有效实施以后，大量的专家和学者到正定来，为正定的发展出谋划策。1984年，他请了一位香港的经济学家做我们正定的经济发展顾问，到我们这里来考察。这位香港顾问，给我们介绍了很多经验，也提供了很多“走出去、请进来、谈项目”的办法，给我们出了很多有用的主意，做了不少事。

也是这一年，习总书记在正定召开三级干部会。会上，他动员人们解放思想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，大力发展乡镇企业，希望我们能够到南方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去走一走、看一看，多学习先进经验。

根据习总书记建议，这一年我们就到浙江温州去考察了一次。那里乡镇企业快速发展，让我们非常震惊，大大开拓了我们的思路，我们也学到了不少有用的东西。第二年，我们一下就上了20多个项目，而且大部分项目都运行得很顺利，我们的乡镇企业就稳稳当当地发展起来了。

采访组：孙师傅，您好！请您谈一谈当年见到习近平同志的情景。

孙树栋：1982年7月，习总书记骑着自行车到我们西兆通调研。那时候，李正同志是公社秘书，负责接待习总书记。我是司机，算个见证人。习总书记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，我第一次见到他，觉得他很年轻、很朴素，穿个绿军装，也没人跟着，骑着“二八”大链盒自行车就来了，跟我们普通老百姓没啥两样，所以给老百姓的印象特别好。

(未完待续)

革命烈士杨树德

· 刘庆功

杨树德，男，汉族，生于1920年，山东省招远县金集镇鞋子村人。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，临汝县第一区底东乡指导员，在1949年3月15日“一、五”区土匪暴乱中，他宁死不屈，壮烈牺牲，年仅29岁。

他早年在家乡参加革命工作，并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48年7月底，随山东省老解放区抽调出的8000余名南下干部，来到豫西开辟新解放区。在当时中共中原局驻地——临汝县第六区（今小屯镇）魔家营、路寨等村，学习整训了一个多月，9月中旬被分配到一区（区政府设在安注村）工作。同杨树德一起分配到一区工作的山东籍干部，还有刘毓进、鲁志平、杨木录等人。他们在区委宋寅、区长郭喜的带领下，逐村进行扎根串连，发动群众，开展诉苦挖穷根活动，启发贫苦农民阶级觉悟，鼓励穷人起来当家做主，树立掌握政权的信心，开展反匪反霸斗争，做好支援前线工作。同年12月，区里召开代表会，组建乡政权，选举乡级领导班子。外地来的干部，都担任了各乡的主要领导，杨树德任底东乡指导员。

杨树德担任底东乡指导员后，开始组建乡政府，从各村农会里挑选一部分积极分子，披红戴花，由各村欢送到乡政府，成为乡干部，脱离生产。当时有些人宣布有职务，没有宣布职务的，一律称为工作人员。底东乡政府设在河坡村，唐长年任乡农会主席，杭安任乡长，王光令任乡文书，刘庆

功任乡农会文书，何印任乡武装队长。

乡、村干部队伍壮大后，进一步推动了反匪反霸的深入开展。通过斗争，收集土匪、恶霸的枪支，除各村建立民兵组织留下一部分，乡干部谁收集到，谁掌握，多余的都上交到乡政府。乡里组建乡中队，何印把枪支分给乡干部掌握。乡工作人员一律深入各村，继续开展反匪反霸斗争。经过斗争的实践锻炼，农会会员逐渐增多了，农会组织逐步壮大了，农村政权逐步巩固了。这样一来，贫苦农民扬眉吐气，斗志昂扬，土匪、恶霸闻风丧胆，低头认罪。

1949年2月，根据党中央、毛主席提出的：“打过长江去，活捉蒋介石，解放全中国”的号召，全县上下普遍开展了动员参军运动。大多有志青年自愿报名参军，出现了父母送子、妻子送夫、兄弟相送的动人局面。在欢送第一批新兵入伍后，不甘心失败的土匪、恶霸、地主等反动势力，暗中造谣生事，伺机反扑，煽动群众说：“谁要参加农会，就把谁家的孩子送去当炮灰，填平长江！”“各地都起来啦（指土匪），共产党站不住脚啦！”“新干部、农会会员没有错，都是外地来的老干部领着叫斗争的，专打外来的老干部！”等等。由于他们抓住了部分群众怕当兵的心理，加上一些乡村干部对共产党必胜、国民党必败的政局认识不清，错误地认为，自己斗争了土匪、恶霸，地主分了人家的财产，这一下可安不住业了，思想动摇起来，怕变天，怕杀头。于是，在一区、五区的安注、夏店、养田等地，地主、恶霸等在幕后，土匪头子刘金岳、郭老六、张文宪等在前台，纠集一些惯匪和不务正业的人，威胁蒙蔽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，拉拢个

别混入政权内部的干部，组成反革命武装，策动了攻打区、乡、村政权，杀害干部的一、五”区土匪暴乱事件。

1949年3月15日上午，杨树德同乡农会文书刘庆功一起，到田堂村开会。该村此时已是谣言四起，民众惶惶不安，会已召集不起来。到一点左右只到五六个人。杨树德在村头向到会者讲了解放战场上的好形势，要大家不要听信谣言，教育安定群众的思想。会议结束后，他们返回乡政府，途经杨堂村时，村干部合向杨树德汇报说，他去送拉煤回来，在段村看到有土匪活动。他们三人边走边说，回到乡政府，吃中午饭时，庄三见等几个村干部也来到乡政府，汇报在附近一带村庄也发现有土匪活动。饭后，杨树德带领刘庆功、何印到段村调查土匪活动是否属实。走出河坡村北场，乡干部范宗有、唐景尧从郝庄方向跑过来，向杨汇报说：“发现底山东北角一带有大量土匪，我们俩不敢在郝庄开会，跑回来汇报情况。”杨树德果断改变原来计划，不顾个人安危，决定带大家到郝庄村查看实情。唐景尧当即向杨表示，他不再去郝庄。从此，回到家里脱离了工作。他们四人同路向郝庄方向奔去。杨树德带一支二八盒子，何印带一支正式长枪，刘庆功带一支汉阳造长枪，范宗有没带枪。走到朱楼村西沟时，杨树德把刘庆功那支枪要过去，走到最前边，何印紧跟着刘庆功和范宗有走在后边。来到郝庄村东北角时，土匪发现杨树德，开枪向杨射击。刘庆功和范宗有走到村东边，发现土匪从西、北两个方向向他们包围。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，刘庆功和范宗有各自选择有利地形，迅速撤退。何印当时就和土匪

接上了头，投敌叛变，和土匪一起攻打安注一区政府。刘庆功在撤退的途中，遇到王光令及乡干队员王良，同他俩一起安全回到乡政府。政府院里没有一个人，刘庆功和王光令商量各自回家等候消息。

那天下午，在郝庄村东北与土匪遭遇后，杨树德向郝庄东南方向撤退，跑到建庄村南地时，范屯挡、李占河（原乡委员）等几个土匪从范庄村内出来，截住了杨的去路。杨树德转身又返回建庄村，进入刘毛拉家，土匪包围了刘家宅院，让李占河同杨树德对话，骗杨出来。杨树德听清是李占河的声音，认为是自己人，出了宅院即被几个土匪架到建庄村东南的砖窑厂上，惨遭枪杀。

五区土匪暴动发生后，中共临汝县委立即调动县独立团、县公安局干警和一、五、七区民兵进行清剿。经过两天追剿战斗，将暴匪匪徒歼灭。第四天，区长郭喜带领区武装队员，到处寻找杨树德的踪迹，在建庄村东南地砖窑找到了杨的尸体，将杨安葬在河坡村西南的一座庙院内。

平息“一、五”区土匪暴乱后，全区开展了肃匪运动，从上而下，由内而外，进行全民性的大查大挖，把土匪暴乱的主谋、首犯、骨干分子，胁从匪众以及通匪人员，查得一清二楚。查清原乡长杭安、武装队长何印均系土匪打入我政权内的骨干分子。在彻底清查土匪暴动的罪恶事实后，经上级批准，将参与枪杀杨树德烈士的凶手何印、范屯挡、李占河拉到杨树德烈士墓前，执行枪决。杭安被判刑，李占河逃到陕西省周至县的深山里，被县公安人员抓获，押回临汝，执行枪决，为死难烈士报仇雪恨。

神泉的传说

相传，汝州温泉是轩辕黄帝最先发现，并被她封为神泉的。4000多年前的一天，黄帝战蚩尤于鹿山，两军对阵，只打得天昏地暗，血流成河。蚩尤占了上风，黄帝的人马受伤惨重。黄帝正准备下令部队撤走，只见汝州西南方向二十多公里处的上空出现了海市蜃楼般的景象。黄帝大喜，急令部队朝着西南方向撤离，不一会，天上的奇景没有了，只留下了一片蒸腾的云雾。黄帝率残兵败将来到了现在的温泉镇，当时这里没有人烟，远远地听见雾霭中有“哗啦啦”奔流的水声。黄帝率众朝着水声走去，看到泉水冒着热气从地上冒了出来，汇成了一条小溪，黄帝命部队停下洗浴修整。伤兵们在温泉里洗浴伤口后，没想到疗效神奇，肿胀消失，伤口愈合，没有了疼痛。伤兵们很快痊愈，恢复了士气，黄帝十分高兴，望着热气蒸腾的泉水说：“神泉，真乃神泉啊！”

从此，温泉被称之为“神泉”至今，温泉是历史上最早的医院，被后人称之为“愈瘳园”。来源《汝州民间故事》

民间故事

讲好革命故事
传承红色基因